

母校百年校庆随感

○ 蒋 康（1962电机）

母校100周年校庆就要来临了。记得1961年母校50周年校庆时，我念大三，看到返校的许多知名校友，他们的大名，久有所闻，现在亲见其人，感到非常荣幸。看胸牌得知，他们大多是上世纪二、三、四十年代毕业的，不禁对这些老前辈肃然起敬。现在发现自己从清华毕业已经快50年了，我的第一感受是：时间过得真快，自己确实老了。

我在清华读书的年代，学校被世人称道的是：清华培养的学生思想政治觉悟高，所学的知识扎实，不怕吃苦，动手能力强。1957年9月一入学，受到的入学教育是“反右派斗争”。当时每个班不到30名学生，被划成“右派”的都在三四个左右。看到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老同学被当成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分子”批斗，表面上我们口号喊得挺响，心灵深处却有一种震撼和害怕的感觉。我竟然庆幸自己晚出生了一年，如果早一年进大学，很可能也会被划到敌人的阵营去了。当时有高年级学生介绍“经验”，说他在反右派运动后，接受“祸从口出”的教训，在衣服口袋里总装着一只小瓶子，如果自己想说话了，就摸摸这个瓶子，提醒自己“守口如瓶”。可见当时清华的“政治气氛”是很浓厚的，广大师生的心情是比较压抑的。我在大一时的高数老师和普通物理老师，他们的课讲得很受同学欢迎，大家都很佩服，但最终都被划成右派，所以当时



2011年9月21日，蒋康学长摄于平山县敬业钢铁厂高炉煤气余热电站

批判他们时，为了划清界线，就有了这些人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说法。反右派之后，学校开展了为期半年的“红专”大辩论，当时辩论的结论，以现在的观点看，“左”到令人惊叹的程度，以至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了。

我在1957年考大学时，全国考生是45万人，总共录取10.5万人，清华录取了1100人。入学后，我发现班上的同学有许多非常聪明，非常有才华，自己与他们相比，是很自卑的。这些同学成了我身边的榜样，激励我努力学习，刻苦学习。当时每天上午上6节课，下午和晚上基本上都泡在图书馆里，包括星期天在内，每天学习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。我现在认为，清华老师水平高，对我们成才是一个非常重

要的因素，但更加重要的因素，是你周围优秀的同班同学，大家互相影响，互相帮助，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学风。

在校期间，大家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，当时班上来自县城和农村的同学占了大约一半，家庭生活富裕的同学很少，大家对于比自己贫苦的同学，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态度，相处非常融洽。我经常叹息，现在能够考入清华的同学，还有多少来自农村的贫苦家庭呢？

当时班上最“奢侈”的活动，是每学期自发组织一次到颐和园的游园活动，都是步行往返，夏季吃一根冰棍，秋季吃一串冰糖葫芦。这种清贫的生活方式，至今令人神往，以至三年前本班同学聚会时，还专门重返颐和园游玩了一天。

那个时代，清华是“工程师的摇篮”，有当时堪称先进和齐全的实验室，同学们对实验课程非常认真，勤于动手，勤于思考。所以当时清华毕业生动手能力强，是社会所公认的。我至今一直自备了一套简单但比较齐全的电工、钳工工具，家里的水电修理，一概自己动手。

我班上在90年代出了两位工程院院士，这在60年代以后毕业的清华所有班级中，是极其罕见的（据说是唯一的）。但是我认为这两位同学也属于工程师类、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超强的高手，好像距离“大师”级，还有较大的差距。我想清华长期作为工科大学领头羊的传统，或许也成了新时期出权威级、大师级人才的一个瓶颈。

清华园的学习生活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，我至今仍然怀念那一段美好的时光，这使我感到终生幸福。但是自从毕业

以后，又一直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怕自己工作表现不好，给母校丢人，怕人说“清华毕业生的水平不过如此”。我退休以后，一直在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工作，这家年产值过10亿的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，恰巧是我毕业那年出生的一位清华年轻校友；不久前，母校热能系二年级7位“更年轻的校友”到公司酒钢烧结余热电站工地实习，又安排我在嘉峪关现场给他们上了几天课，人老了老了，又转回清华这个“圈子”，真是令人感叹！

我现在已经71岁了，对工作仍然充满热情，兢兢业业，力求做得完美。我的这篇稿子是在四川万源市郊一家水泥厂余热发电工地写的，工地的生活紧张、清苦、单调，但是我喜欢。我已经为祖国健康地工作48个年头了，离实现清华人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目标，已经近在咫尺了。这也是我对母校培养，回馈社会的实际行动吧。

百字令·贺母校百年华诞

○马振良（1977级电机）

紫光云端。庆华诞、遍迹人间春色。
 百岁光阴，堪道是、桃李纷飞清绝。
 科技群星，兴邦志士，谱写丹青页。
 荷花湖畔，孕生无数豪杰。
 更看水木今朝，人文挺秀，漫溢中华骨。
 问鼎一流扬奉献，畅想凯歌千阙。
 崇实求真，复兴伟业，难捺胸中血。
 炎黄骄子，疾书擎日栽月。